

十批判書

商建文



十批判書

郭沫若著

• 1951 •

一九四五年九月增訂第一版 重慶印 0001—2000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增訂第五版 上海印 7501—10000冊

一九五一年八月新一版 上海印 10001—13000冊

●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2) 全[甲—2] 羊 24,000

光華印刷廠承印

「十批判書」正誤表

頁	行	誤	正	頁	行	誤	正
20	8	百奇。	百奇。』	305	6	命名而成辭	合名而成辭
23	11	太公	太王	309	6	[引文出 <u>禮記</u>]	(<u>史記孟荀列傳</u>)
29	8	有虛	有廬	319	6	保持	保存
34	3	晦晦賢	晦(晦)賢	321	12	脫離了	脫離着
		百(賤)(歎)	百晦(歎)	328	14	魯衛	魯衛
39	2	Helos	Heiots	329	9	所作,	所作。
42	註1	反二。或	反二或	329	9	二篇,	二篇。
		反三	反三。	329	9	長平之勝。	長平之勝,
44	11	二十五奇	二十個奇	335	4	遲死商鞅	遲商鞅死
50	2	卽行	卽刑	339	13	憑箒	憑藉
50	4	諸侯	諸侯	344	6	綜合事實	綜合名實
54	3	官室	宮室	344	9	引在左列	引用左列
74	9	市儉商業	市井商業	347	4	言法	爲法
76	4	例如	譬如	347	9	爲術	言術
80	3	旁柱,	旁柱。	347	10	所師	所飭
100	2	但就	但在	350	14	未徧聞	未徧聞
111	9	論匠	輪匠	352	2	寫得是	寫得來
161	11	老斨	老聃	360	9	辨析	辨析
161	12	老斨	老聃	361	1	夫其所乘	失其所乘
162	9	楚狂, 接輿	楚狂接輿	367	10	所愛用	所愛用的
167	5	狗白	狗, 白	371	11	因是	因爲
172	4	弗親	弗躬	378	3	鳩毒	鳩毒
177	10	在這	這在	379	12	有道之王	有道之主
192	5	六十曰老	七十曰老	385	9	因問篇	小問篇
196	12	心至於符	心止於符	385	10	「三節	『三節
206	10	誰非誰是	誰非誰是。	394	7	三十三年	一九四四年
222	12	聖人明之	聖人明知之	423	1	殊也』	殊也』
237	13	散民	散名	449	6	一尊	一尊,
261	1	以物法者	以物爲法	462	13	倫敦	倫敦
276	9	徧爲	徧爲	463	12	當是時翦,	當是時, 翦
277	14	請循	「請循	506	5	殘忍	殘忍
284	10	便不	便是	506	5	盲女	盲妹
304	10	當謂	謂當				

目 錄

一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一
二	孔墨的批判	二
三	儒家八派的批判	一〇
四	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	一五
五	莊子的批判	一九
六	荀子的批判	二七
七	名辯思潮的批判	三七
八	前期法家的批判	三七

九 韓非子的批判

.....三四七

十 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

.....三九五

後記

.....三七

——我怎樣寫「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

後記之後

.....四九八

改版書後

.....五〇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一) 古代研究上的資料問題

關於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我前後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工夫，現在是達到了能夠作自我批判的時候，也就是說能夠作出比較可以安心的序說的時候。

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一九二〇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有的朋友還沿用着我的錯誤，有的則沿用着我錯誤的徵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這個責任，現在由我自己來清算，我想是最適當的，也是頗合時宜的。

我在這兒想先檢討一下處理材料的問題。

A. 關於文獻的處理

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檢討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

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着痛苦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卻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

關於文獻上的辨僞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學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雖然相當透徹，但也不能說已經做到了毫無問題的止境。而時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十五年才開始的。

例如周易固然是無問題的先秦史料，但一向被認為殷末周初的作品，我從前也是這樣。據我近年來的研究，才知道它確是戰國初年的東西。●時代拉遲了五六百年。我在前把周易作為研究殷末周初的資料，當然是完全錯誤。

又如尚書，我們早已知道有今古文之別，古文是晉人的僞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裏面也有真偽，也是到近年來才開始注意到的。例如堯典（包括古文的舜典）、皋陶謨（包括古文的益稷）、禹貢、洪範這幾

篇很堂皇的文字，其實都是戰國時代的東西——我認爲當作於子思之徒。我在前雖不曾認典謨爲「虞書」，禹貢爲「夏書」，以作爲研究虞夏的真實史料，但我卻把洪範認爲確是箕子所作，曾據以探究過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錯誤。

呂刑一篇，文體與左傳相近，舊稱爲周穆王所作，我也相信不疑。但其實那也是靠不住的。我揣想它是春秋時呂國的某王所造的刑書，而經過後來的儒者所潤色過的東西。呂國會稽王，彝器中有呂王作內姬壺可證，由文字上看來是春秋時的器皿。呂國是大嶽伯夷之後，故呂刑中兩稱伯夷，而位在禹稷之上。這已儘足以證明它決不是周穆王所作的了。

詩三百篇的時代性尤其混沌。詩之彙集成書當在春秋末年或戰國初年，而各篇的時代性除極小部份能確定者外，差不多都是渺茫的。自來說詩的人雖然對於各詩也每有年代規定，特別如像傳世的毛詩說，但那些說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月流火一詩，毛詩認爲「周公陳王業」，研究古詩的人大都相沿爲說，我自己從前也是這樣。但我現在知道它實在是春秋後半葉的作品了。就這樣，一懸隔也就是上下五百年。

關於神話傳說可惜被保存的完整資料有限，而這有限的殘存又爲先秦及兩漢的史家所凌亂。天上的景致轉化到人間，幻想的鬼神變成爲聖哲。例如所謂黃帝（即是上帝，皇帝）堯舜其實都是天神，卻被

新舊史家點化成爲了現實的人物。這項史料的清理，一直到現在，在學術界中也還沒有十分弄出一個眉目來。但這無寧是屬於史前史的範圍，已經超出了古代，並已經超出了歷史了。在這一方面，我雖然沒有作出什麼特殊的貢獻，但幸而早脫掉了舊日的妄執，沒有陷入迷宮。

B. 關於卜辭的處理

靠着殷虛的發現，我們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資料，是我們現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就靠着這一發現，中國古代的真面目才強半表露了出來。以前由後世史家所累積構成的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統已被證明全屬子虛，即是夏代的有無，在卜辭中也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但至少殷代的存在是確實被保證着了。

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發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它們的訛傳。如上甲之次爲乙、丙、丁，而非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訛，大丁以文丁爲是，均抉發了

● 呂刑首句是「唯呂命王享國百年。」古者命爲一字，「令王」殆假爲靈王，百年當是四年之譌，古文四與百形極相近。

● 參看拙作由周代農事詩說到周代社會（中原四期，亦見青銅時代）

三千年來所久被埋沒的祕密。我們要說殷虛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絲毫也不算過分的。

繼王國維之後，在這一方面貢獻最多的要算是董作賓。他同李濟博士從事殷虛的科學發掘固然是永不磨滅的功績，而董氏在卜辭研究上進到斷代研究的一步，在作為他個人的功績上是尤其輝煌的。卜辭是由武丁至殷末（董氏以為迄於殷亡，余則信只及帝乙中年，論尙未定）的遺物，綿延二百年左右，先年只能混沌地知其為殷，近年來主要即由於董氏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每一辭或每一片甲骨是屬於那一王的絕對年代了。這樣便更增進了卜辭的史料價值，在卜辭本身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發展了。

我自己在這一方面也盡了一些棉力，如王國維發現「先妣特祭」之例，足證殷代王室還相當重視母權。但我繼進又發現了所特祭的先妣是有父子相承的血統關係的，便是直系諸王的配偶雖被特祭，而兄終弟及的旁系諸王的配偶則不見祀典。這又證明立長立嫡之制在殷代已有它的根蒂。

以上可以說是幾項重要的發現。卜辭的研究雖然由王國維開其端，但嗣後的成績卻比王氏更大的進步了。

王氏在卜辭研究之餘有殷周禮制論之作，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這是一篇轟動了全學界的大論文，新舊史家至今都一樣地奉以為圭臬。在新史學方面，把王氏的論文特別強

調了的，首先是我，我把它的範圍更擴大了，從社會發展方面來看，我認爲殷代是原始公社的末期，周代是奴隸社會的開始。這一擴大又引起了別一種的見解，認爲殷代是奴隸社會的末期，周代是封建社會的開始。這見解到現在都還在相持，但其實都是由於演繹的錯誤。

我自己要承認我的冒昧，一開始便把路引錯了。第一我們要知道，殷周禮制論的價值已經不能夠被這樣過高估計了。王氏所據的史料，屬於殷代的雖然有新的發現而並未到家，而關於周代的看法則完全根據於『周公制作之本意』的那種舊式的觀念。這樣，在基本上便是大有問題的。周公制禮作樂的說法，強半是東周儒者的託古改制，這在目前早已成爲定論了。以這樣從基本上便錯誤了的論文，而我們根據它，至少我們可以說把歷史中飽了五百年，這是應該嚴密清算的。

卜辭研究是新興的一種學問，它是時常在變遷着的。以前不認識的事物後來認識了，以前認識了的後來改正了。我們要根據他作爲社會史料，就應該採取『迎頭趕上』的辦法，把它最前進的一線作爲基點而再出發。目今有好些新史學家愛引用卜辭，而卻沒有追蹤它的整個研究過程，故往往把錯誤了的仍然沿用，或甚至援引錯誤的舊說以攻擊改正的新說，那是絕對得不到正確的結論的。

C. 關於殷周青銅器的處理

在古代研究上與卜辭有同等價值或甚至超過它的，是殷周青銅器的銘文。關於這項資料的研究，在北宋時已開其端，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了。

近五十年來研究這項學問的人才輩出，如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都是很有貢獻的。

這項資料之所以與卜辭有同等價值或甚至超過它，是因為它也是第一手的資料，數量既多，而且銘文有長至四五百字的，與卜辭的簡短而幾乎千篇一律的情形不同。但這項資料也有它的缺陷，便是出土地多不明白，殷周兩代千有餘年，各器的時代相當混沌。故如深懂科學方法的王國維，他便發出了這樣的慨嘆：「於創通條例，開拓闡奧，慨乎其未有聞」（殷虛書契考釋序）。這是很知道甘苦者的評判，而決不是漫無責任，任意抹煞一切者的放言。

王氏心目中的「條例」究竟是怎樣，因為他自己沒有「創通」出來，我們無從揣測，但我們準一般史料研究的公例，大凡一項資料，總要它的時代性準確，然後才有充分的史料價值。殷周的年代太長，渾而言之曰殷周，或分而言之曰殷曰周，都太含混了。因此自北宋以來無論僅存於著錄或尙流傳於人間的器物儘管將近萬件，而卻是一團大混沌。

以前的人也略略分殷分周，甚至有分出夏代來的，但所謂夏器近已被證明不是偽器便只是春秋末年的作品。夏器迄今在銅器中尙無發現。殷周之分所據的標準是所謂「以日爲名」。古時傳說殷人以生

日爲名，故名中多見甲乙丙丁字樣，因此凡彝銘中有祖甲父乙，妣庚母辛，或兄壬婦癸者，在前便一律認爲殷彝。其實這標準是不一定可靠的。近年發現穆王時的盃，有「文考父乙」，懿王時的匡，有「文考日丁」，足見「以日爲名」之習至西周中葉都還存在，而且已被證明，不是生日而是死日了。這一條例一被打破，於是舉凡以前的著錄中所標爲殷器的都成了問題，而尤其像羅振玉的殷文存那部書，主要根據「以日爲名」而蒐集的七百種以上的器皿，差不多全盤靠不住。我說「差不多」，因爲那裏面有些確是殷器。據我們現有的知識，凡疑似殷器中可確切斷定爲殷器的還不上一打。因此，我在前無條件地把殷文存作爲研究殷代的資料而使用，近來還有不少的朋友以訛傳訛，我是要承認我的冒昧的。

中國青銅器可確定爲殷代的均屬於殷末，在其前的還未發現。一出馬，青銅冶鑄的技術便很高度，這是很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在黃河流域更早期的器皿還未發現，還是根本沒有而那技術是從南方的江淮流域輸入的，這些都只好等將來的地下發掘來回答。我揣想後者是比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爲古來相傳江南是金錫的名產地，而南方的發掘先例向來是很少的。或許是南方低濕，古器不容易保存的原故吧？

周代的銅器很多，在前依然只是一片渾沌，即使偶有年代劃分也是漫無標準。例如很有名的毛公鼎，以前的人便認爲是周文王的兒子毛叔的東西，但近年已經知道它是周宣王時代的作品了。我自己費了

3
五六年的研究，得到一個比較明晰的系統，便是我所著錄的兩周金文辭大系的圖錄和考釋。我是先尋到了一些年代自己表明了標準器，把這些作為連絡站，再就人名、事蹟、文辭的格調、字體的結構、器物的花紋形式等以為參驗，便尋出了一個至少比較近似的條貫。凡有國度表明了，也就國別中再求出時代的先後。就這樣我一共整理出了三百二十三個器皿，都是銘文比較長而史料價值比較高的東西。兩周八百年的渾沌似乎約略被我鑿穿了。從這兒可以發展出花紋學、形制學等的系統，而作為社會史料來徵引時，也就更有着落了。

就兩周的銅器而言，武王以前的器物無所發現，武王以後的則逐代增多。但西周的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諸侯國別之器極其罕見，到了東周則王室王臣之器匿跡，而諸侯國別之器極其盛行。從這兒可以看出文化的進展，武王以前的周室沒有什麼高度的文化，平王以後的周室則是式微得不堪了。

毫無問題，周人的文化是承繼着殷人來的，單從文字的演變上也可以尋出它們遞禫的痕跡。周人承用殷人文字，每每有類似之字而被周人錯用了的（即是後人的寫別字），如夂本犂字被用為勿，即其一例。

周人的彝器得到整理，於是乎周公制禮作樂之說純是一片子虛。周公在周初是一位有權變的政治家，那是毫無疑問的。但周人的禮強半是在西周三百年間逐漸累積而成，其中毫無疑問有很多殷禮的成

分，至其構成爲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老實說是自戰國中葉以後。這層關係不明而縱論「殷周禮制」那是必然要錯誤的。

大體上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所說過的話依然正確，便是「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在前的王國維，其後的我，又其後的認西周爲封建制的新史學家們，其實都是錯了的。

D. 古器物中所見的殷周關係

先就卜辭考察，殷人自己是始終稱爲商，不稱爲殷的。稱殷似乎是出於周人的敵愾，初稱爲「衣」，古書中或作郛，在古與衛當是一字。入後更轉爲殷。呂氏春秋慎大覽「親郛如夏」高誘注云：「郛讀如衣，今袁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康誥「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武王時代的大豐簋「丕克三（減）衣」衣祀，魯煬公時的沈子筮也稱「迺妹（攸）克衣」，「衣」字就是殷字。但到周康王末年的大孟鼎便直稱爲殷了——「我聞殷墜命，惟殷邊侯甸，粵殷正百辟，率肆于酒。」

衣本是一個小地名，在卜辭裏時常見到，是殷王田獵的地方，據我考證，當在河南沁陽縣境內，即是水經沁水注所說的殷城。周人對於敵國不稱其本號的商，而稱爲衣或殷，大約也就如像我們現在寧願稱日本爲倭，而日本人也寧願稱中國爲支那一樣的吧。

周人在卜辭中屢次出現，有一例稱爲「周侯」的，此外有幾例說到「聘周」，大抵都是武丁時候的卜辭，足證殷周本來是同盟兄弟之國。關於「聘」字結構很奇怪，照那最複雜的一個字樣寫下來可以寫成「𠄎」字，我從前釋爲寇，那是不正確的。按照字的構成應該是從「玉」由（缶也，盛玉之器）「𠄎」（古兵字）聲，說爲聘字，較爲合理。武丁以後，周人在卜辭裏面便很少見了。

據古本竹書紀年言「文丁殺季歷」，大約是實在的事。自此以後殷周遂成世仇，周文王蓄意報復，沒有成功，到周武王的手裏公然也就把仇報了。

但周武王之所以能够報仇雪恨把殷朝的王室顛覆了的，倒並不是因爲殷紂王（帝辛）怎樣暴虐，失掉了民心，而實在是另有另外的一段歷史因緣的。這段古史的真相也因卜辭的發現才得大白於世。

殷末在帝乙帝辛兩代，曾長期和東南夷發生戰爭。據卜辭所載，帝乙十年及二十年屢次征討夷方，地點不是在山東的齊與雇，便是在淮水流域的條與濰，和「漸居淮岱」的東南夷合拍，可知夷方即指東南夷。在帝辛的一代，左傳上也屢屢說到，說他「爲黎之蒐而東夷叛之」，說他「克東夷而殞其身」，說他「百克而卒無後」，可見帝辛繼承父業，屢次用兵，終於是把東南夷平定了。故爾他能「有億兆夷人」作他的「臣」——就是奴隸。俘虜能有億兆，戰爭可見猛烈，殷將士的損失也必定不在少數。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邊周人乘虛而入，殷紂王用俘虜兵對敵，卒致「前途倒戈」，遭了失敗，這便是殷周之際的所謂征誅。